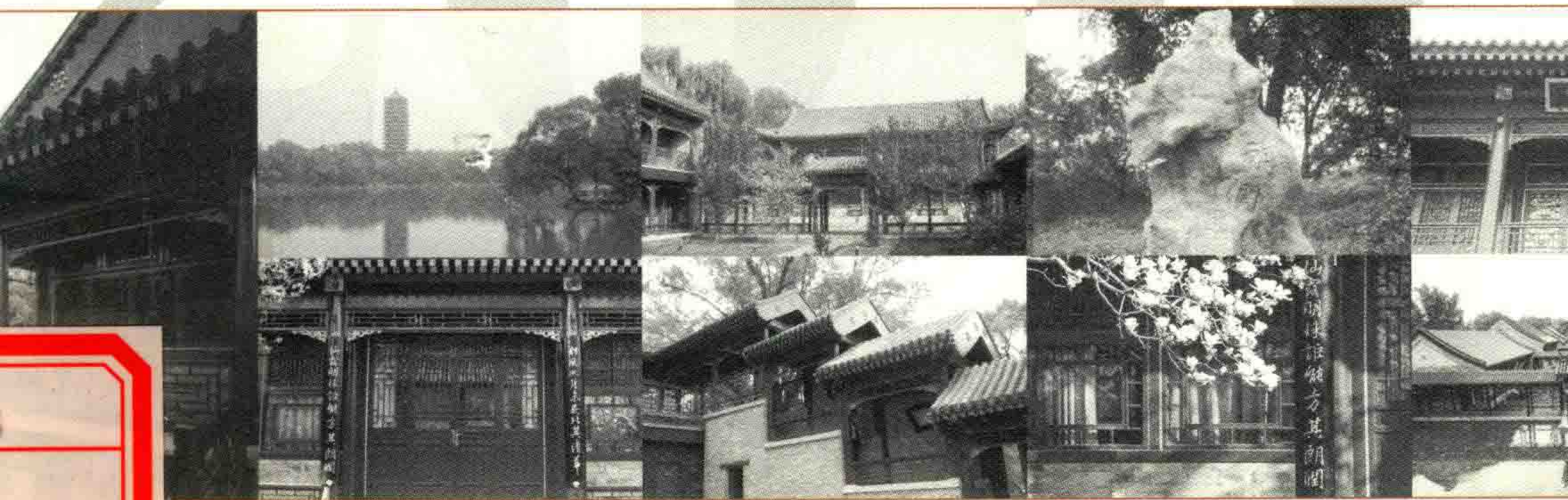


北大国家发展报告系列

朗润园观点

林毅夫 姚洋 黄益平 等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北大国家发展报告系列

朗润园观点

林毅夫 姚洋 黄益平 等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朗润园观点 / 林毅夫等著.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12
(北大国家发展报告系列)

ISBN 978-7-111-55637-4

I. 朗… II. 林… III. ① 社会发展—中国—文集 ② 中国经济—经济发展—文集
IV. ① D668-53 ② F12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6614 号

朗润园观点

出版发行: 机械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2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责任编辑: 冯小妹

责任校对: 殷虹

印刷: 北京市荣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170mm × 242mm 1/16

印张: 19

书号: ISBN 978-7-111-55637-4

定价: 49.00 元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客服热线: (010) 68995261 88361066

投稿热线: (010) 88379007

购书热线: (010) 68326294 88379649 68995259

读者信箱: hzjg@hzbook.com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封底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本书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韩光 / 邹晓东

华章经管
HZBOOKS | Economics Finance Business & Management

林张论战与朗润园精神

（代序）

2016年11月9日下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了一场“产业政策思辨会”，院里的两位教授林毅夫、张维迎同台交锋。虽然经济学家之间有不同的观点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但同一个单位的两位经济学家在几百名现场观众和数十万名网民面前公开辩论一个经济政策问题，应该是第一次。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讨论应该被写入中国经济学的历史。

辩论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大概并不指望一次这样的讨论就能统一对于产业政策问题的看法。在1932年2月的伦敦开始的那场在凯恩斯和哈耶克之间的争论，到今天也还没有结束。其实，林毅夫和张维迎之间的这场争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凯恩斯和哈耶克之间的那场争论的继续。虽然事后有学者评论说，林张对产业政策的定义并不一致，但毕竟通过这场讨论，他们观点的异同之处已经亮在了明处。

应该说，举办这样一场公开辩论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倡导朗润园一直在坚持践行的“和而不同”的学术风气。林张短兵相接的争论，甚至一些激烈的语言，可能已经在很多观众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其实还有公众不容易看到的另一个画面，在2015年年末朗润园的新年联欢晚会上，林张并肩而坐，一起观看节目，一起开怀大笑。只有把这两个画面放在一起，才能完整地反映朗润园的精神风貌。

这次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并不是林张之间的第一次交锋，在1995年的

“北大交火事件”中，他们就国企改革的方向发生了争论。在2014年，他们再次就政府定位和后发优势问题展开辩论。而这次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始于2016年暑假期间，8月21日，林毅夫老师在上海的一个研讨会上发表了“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的报告。四天之后，张维迎老师在西安的一个论坛上做了“为什么产业政策会失败”的演讲。

由此开启了一场关于产业政策问题的全民大讨论。一时间，关于产业政策的各种观点充斥几乎所有的论坛、微信群和媒体平台，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和社会大众纷纷发表各自的观感，有的支持林老师，有的赞成张老师，有的则各打五十大板。林张也间接地通过媒体渠道交了几次手。

但隔空打炮，无论对辩论双方还是“吃瓜群众”来说，都难免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于是，我建议二位面对面地坐下来做一次讨论，他们均表示愿意参与。原本的设想是做一次闭门研讨，主要是担心不准确的媒体报道误导公众，但院长姚洋认为，公开辩论更能体现朗润园和而不同的精神。出乎意料的是，两位老师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就这样，一场轰动全国的政策辩论便隆重登场。后面的故事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辩论会之后，有不少朋友问我对这场争论的看法，赞同林还是支持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这主要是因为我并不研究产业政策，无论说什么，都可能会有不专业之处。但如果问我的经济学直觉，在这个问题上，我可能就是典型的“一方面和另一方面”型学者。对于两位的立场，我都有赞同与保留之处。

从提出政策建议的目的出发，我赞同林老师关于经济发展需要产业政策的主张，这对于面临产业升级压力的国家尤其如此。但其实我也很担心，倘若没有适当的制度约束，“有为政府”很容易演变成“乱为政府”。正如林老师所说，世界上的大部分产业政策都不成功。因此，我又同意张老师的主张，如果不能保证政府做好事，不如让政府少做事。但对张老师的“产业政策就是穿了马甲的计划经济”和“不存在市场失灵”这样一些判断，我尚留

有很大的疑问。

但这些并不影响我对二位的尊敬。在我的心目中，林老师是一位勤奋的经济学家，在努力地尝试着为发展中国家探寻一条走向繁荣的道路。而张老师则更像是一位执着的意见领袖，时刻提醒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失败的后果要比市场失灵严重许多。

根据他们对政府与市场的不同定位，公众很容易把林张看作分处中国经济学家光谱两端的代表人物。但如果做更进一步的了解，会发现他们其实有很多共同之处。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中央政府的智库成员，他们都已经活跃在政策分析的第一线。他们都曾留学海外，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们也都在对现代经济学做深刻的反思。后来他们作为联合创始人，一起建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致力于推进现代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

朗润园“和而不同”的精神，是由创始人和早期加入的学者一起共同倡导并发展起来的。用姚洋院长的话说，朗润园的精神传承，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风云一时的发展所和体改所，以及在20世纪90年代处于鼎盛时期的留美经济学会。朗润园早期的一些骨干老师几乎都来自于这几个机构，他们既脚踏中国经济的现实，又手握现代经济学的原理。在学术问题上，不强求思想统一，而追求“百花齐放”与“和而不同”。

过去20多年来，朗润园的老师门一直在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关于经济改革问题的公共讨论。最近发生的这场林张论战，不是朗润园学者之间的第一次交锋，当然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目 录

林张论战与朗润园精神（代序）

第一部分 产业政策与制度

产业政策与我国经济的发展：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 2

为什么产业政策会失败 / 12

怎样才算好的产业政策 / 19

国企混改、债转股可以一箭三雕 / 27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可优先考虑对创新型国企实施债转股
混合所有制改革 / 31

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政府” / 38

进一步发展混合所有制要坚持四个注重 / 44

第二部分 财政金融改革

以三个委员会为核心机制重构监管框架 / 52

改革公共财政，兼顾效率与公平 / 57

财政需要出大招 / 62

哪类P2P平台最容易出问题 / 70

金融监管：机构分合须谨慎，高层协调是关键 / 75

利用大数据构建互联网金融情绪指数 / 84

第三部分 **宏观经济热点与趋势**

中国跻身高收入国家有独特优势 / 92

稳定2016经济增长须提高有效需求 / 99

中国跨越关口离不开金融改革 / 103

2016，结构性改革与调整攻坚之年 / 109

关于民间投资和融资结构的一些问题 / 116

中国经济怎么了：双重调整的现状与应对 / 120

中国经济怎么了：本轮调整的难点与亮点 / 130

政策不确定性、产权歧视和杠杆率国进民退 / 143

僵尸企业挤出民间投资 / 149

破解中国高杠杆陷阱 / 154

中国经济到底会不会“左右为难” / 163

把“通缩”这个幽灵看个透 / 170

应对通缩要用中国功夫 / 191

“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 / 209

房价飙升需标本兼治 / 217

第四部分 公共服务改革

如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 / 226

中国医改谏言 / 231

海关新政要顺势而为：汽车不能再向马车靠拢 / 236

第五部分 企业经营管理

在巨变的环境下，企业如何获得可持续增长 / 244

互联网思维与商业模式创新 / 256

大国为何无以师小国 / 262

激活创新源头：政府不可或缺的担当 / 269

成吉思汗：帝王级创业的四个必杀技 / 275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必须直面的十大问题 / 280

如何获取核心竞争力 / 283

新技术来了，可营销还是那个营销 / 289

1

第一部分

产业政策与制度

产业政策与我国经济的发展： 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林毅夫

许多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但是尚未见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和保持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产业政策之所以需要，是因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既要有企业家的个人努力，也需要有政府帮助企业解决企业家自身难以克服的外部性和相应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所能使用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不能对所有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提供帮助，因此，只能策略性地使用其有限资源，优先帮助能对经济持续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产业。这种有选择性地使用资源帮助某些产业的企业家克服外部性和协调问题的措施就是产业政策。经济学家不能因为怕产业政策失败而对产业政策一概反对，也不能因为产业政策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无条件地支持一切产业政策，而是要研究清楚产业政策成功和失败的道理，以帮助政府在使用产业政策时，减少失败，提高成功的概率。本文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为何经济发展需要产业政策才能成功，为何多数产业政策失败，以及我国如何才能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人均收入不断增加，其前提是越来越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现有产业中产品的质量 and 生产效率；二是通过产业升级，将现有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到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分

析，这两者的实现需要“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的共同作用。

“有效的市场”的重要性在于，引导企业家按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和产业，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的同类产品中，成本才会最低，才会最有竞争力，企业才能获得最大的利润，整个经济才可以创造最大的剩余和资本积累，使得比较优势从劳动或自然资源密集逐渐向资本密集转变，为现有产业、技术升级到资本更为密集、附加价值更高的新产业、新技术提供物质基础。企业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前提，则是必须有一个能够很好地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如果有这样的价格体系，企业为了自己的利润和竞争力，就会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合适的技术和产业，这种价格体系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才会存在。所以，按比较优势发展产业、选择技术的前提是，要有一个“有效的市场”。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为的政府”也必不可少。首先，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资源必须随着要素积累、比较优势变化，不断从现有技术和产业配置到新的效率更高的技术和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的结构变迁过程。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必须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如果没有其他必要的安排，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倘若失败，将承担所有成本，并让后来者知道螃蟹不可吃，不去犯同样的错误。倘若成功了，后来者将会随之涌进，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不会有垄断利润。也就是，如果没有其他必要的安排，对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而言，失败的成本和成功的收益是不对称的；而从社会的角度看，不管失败还是成功都给后来者提供了有用的信息。因此，政府需要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一定的激励，这样，企业家才会有积极性去冒这个风险。发达国家的专利制度发挥的就是这种功能。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一般是在国际的技术和产业链内部来进行，多数情况下不能给予专利，但是，仍然需要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以必要的激励。当然，这种激励需要找到其他合适的替代方式。

其次，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成功与否，并不完全决定于企业家个人的

勇气、智慧和企业家才能。例如，要进入一个新的产业，所要求的从业人员的技能和以往的产业不尽相同，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如果完全靠自己培训员工，后来的企业可以以稍高的工资聘走拥有新技术的员工，而使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蒙受损失。新产业所需的资本规模和风险也通常会比原有的产业大，需要有新的能够动员更多资本、有效分散风险的金融制度安排和其匹配，这也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随着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以及资本密集度和规模经济的提高，市场的范围和交易的价值会不断扩大，交通、电力、港口等硬的基础设施和法律、法规等软的制度环境，也必须随之不断完善，这些完善显然超出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的能力范围。随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技术和产业会越来越接近国际前沿，新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的升级需要与这些新技术和新产业相关的基础科学的突破，基础科学的研发属于公共产品范畴，其发现不能申请专利，企业家不会有积极性持续地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凡此种困难，均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来协调不同的企业加以克服，或是由政府自己直接提供相应的服务。只有这样，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能顺利进行。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动员和配置的资源有限，不可能满足各种可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所需的外部性补偿，以及完善所有相应条件的要求。因此，和企业一样，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也必须对可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经济和社会回报做出甄别，按“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精神，以“产业政策”集中有限资源，协助企业家从事那些回报最高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最好最快地发展，避免陷入“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同样，发达国家的政府也必须对其企业家所要从事的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和新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基础科研给予支持。由于发达国家可以用来支持基础科研的经费并非无限，因此，也和发展中国家一样，必须根据可能的回报来配置有限的科研资源，这种配置就是一种产业政策。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用产业政策时经常失败，除了执行能力的问题之外，究其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容易出于赶超的目的，而去支持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果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只能靠政府永无止境的保护补贴来生存。成功的产业政策必须是有针对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所谓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指的是该产业的要素生产成本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有优势，但是由于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善，交易费用太高，总成本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竞争力的产业。政府若能针对这些产业中的先行企业给予外部性补偿并帮助提供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则这样的产业政策能够使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变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如何在“有效的市场”环境中发挥“有为的政府”的作用，推动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以及将来从中高端向高端升级，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根据现有产业和国际前沿的差距，可将我国的产业分成五种不同类型，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各有差异。

第一种是追赶型产业。2014年，我国人均GDP为7 500美元，同年美国的人均GDP是57 101美元，德国是44 999美元，日本是38 491美元，韩国是24 329美元。这种人均GDP的差距反映的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距，代表我国现有产业的技术和附加值水平比发达国家同类产业的水平低，处于追赶阶段。我国的汽车、高端装备业、高端材料即属于这种类型。

对于追赶型产业，我国各地政府和金融机构可以在资金融通和外汇获取上支持所在地的合适企业像吉利汽车、三一重工那样，到海外并购同类产业中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发达国家自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发展乏力，很多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经营不好，低价求售，出现了许多好的并购机会。

在没有合适的并购机会时，各地政府也可以提供方便，支持所在地的企业像华为、中兴那样，到海外设立研发中心，直接利用国外的高端人才来推

动技术创新。

另外，各地政府也可以筛选我国每年从发达国家大量进口的高端制造业产品，根据其地区比较优势，创造这些产业所需的基础设施，改善营商环境，到海外招商引资，把那些高端制造业产品的生产企业吸引到国内来设厂生产。我国现在的GDP规模约占世界的14%，在新常态下，每年6.5%以上的增长意味着我国每年对世界贡献将近1个百分点的增长。现在世界每年的经济增长在3个百分点左右，也就是说，我国每年对世界市场容量扩张的贡献率达到30%。如果地方政府能够根据这些高端制造业的需要提供合适的基础设施、人才培养、营商和法制环境，国外许多高端生产企业会有很高的积极性到国内设厂生产，以满足我国不断扩大的需求，并以我国为生产基地，供应世界各地的市场。江苏省太仓市的中德企业合作园区2012年被工信部授予“中德中小企业合作示范区”，到2014年年底吸引了220家德国企业入园，投资总额达20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在中高端产业的招商引资上，我国仍处于大有作为的机遇期。

第二种是领先型产业。我国作为中等偏上国家，有些产业，像白色家电、高铁、造船等，其产品和技术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或已接近国际最高水平。领先型产业必须自主研发新产品、新技术，这样才能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

自主研发包括两种不同性质的活动：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以及新产品、新技术开发所需的“基础科研的突破”。企业开发的新产品、新技术可以申请专利，这类活动理当由企业自己来进行。但是，基础科研不仅投入大、风险高，而且其产品是“论文”，属于社会公共知识，企业没有从事基础科研的积极性。

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绝大多数产业属于领先型产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所需的基础研究，绝大多数是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高校，或是由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等政府支持的科研机构来进行，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

或地区也以政府的资金支持类似的机构来进行这方面的基础研究。我国自然也必须采取同样的方式来支持领先型产业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所需的基础科研。

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用财政拨款设立科研基金，支持所在地领先型产业的企业与科研院校协作进行基础科研，支持企业开发新产品、新技术。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可以以资金支持相关行业的企业组成共用技术研发平台，攻关突破共用技术瓶颈，在此突破的基础上再各自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在企业新技术和产品开发取得突破后，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可以通过采购，帮助企业较快地形成规模化生产，以降低单位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领先型产业需要到世界各地建立销售、加工生产、售后服务等网络，以开发市场，中央和各地政府也需要在人才培养、资金、法律、领事保护、投资保护上给予相关企业海外拓展必要的支持。

第三种是退出型产业。这类产业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另一类是在我国还有比较优势，但是产能有富余的产业。

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是最典型的第一类产业。这类产业最主要的成本是工资成本。目前，我国一线工人的月工资是 3 000 ~ 4 000 元人民币，相当于 500 ~ 600 美元。到 2020 年“十三五”结束，实现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目标，加上人民币升值，普通工人的月工资至少会上升到 1 000 美元。这类产业在我国失掉比较优势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面对这种挑战，我国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中的一部分企业可以升级到品牌、研发、品管、市场渠道管理等高附加值的微笑曲线两端。从事生产加工的多数企业则只能像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日本和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亚洲四小龙的同类产业中的企业那样，利用其技术、管理、市场渠道的优势，转移到海外工资水平较低的地方去创造第二春，把我国的 GDP 变为 GNP，否则必然会因竞争力丧失、海外订单流失而被淘汰掉。这些加工企业在海外